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Universities in China's
Republican Period*

Shen Weiwei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民国大学的文脉

沈卫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资助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英文标识简称 PAPD）
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南京大学 985 工程项目经费资助出版项目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Universities in China's
Republican Period*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民国大学的文脉

沈卫威 著

本书入选 2007 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07WXB009)
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51060)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大学的文脉/沈卫威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02-010256-3

I. ①民… II. ①沈… III. ①学院派—文学研究—中国—民国—文集
IV. ①I2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8807号

责任编辑 付艳霞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校对 刘晓强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50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页2

版 次 2014年1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256-3

定 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绪 论	入林见树	1
第一章	异口同声	16
第二章	旧学新知	33
第三章	雅言俗语	67
第四章	激进保守	90
第五章	学分南北	131
第六章	古典现代	174
第七章	公德私情	201
第八章	荣辱堪当	238
参考文献		276

绪论 人林见树

“民国大学的文脉”这一融合学术史与文学史的研究路向,是我长时段的一个学术关注点。在这个巨大的知识和思想的时空里,首先是外敌入侵、残酷的党争、内战以及自然灾害的笼罩,谁也摆脱不开。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首先是驱除外敌,结束内战,进而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建。旧有的道统、学统和家法,新学的科学、民主、自由理念,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需要被一个整体包容的氛围有条件地吸收、整合。延续晚清的一些学理之辨,如华夷、汉宋、古今、中西、新旧、有用无用,已经被一些新的政治观念和国家话语如主义、政党、革命、反革命、战争、和平、解放所取代,或被王国维这样的学者主动放弃。在这个学术与政治纠缠,公德与私情纠结,个体与社会、家国难分的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的个人担当和国家、民族对个体的责任,都是无法说得清楚的,甚至双方都不能完全兑现各自的承诺。因此才会有种种矛盾、对立和不公平。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都是我们后来的探究者所必须正视的。同情的理解固然是一个好的托词,同时也要提醒自己,事实本身不容以任何理由人为地遮蔽。特别是国共两党之争和日军侵华这两个无法绕过的历史事实。我以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为主要考察对象,还原历史语境,本着为见树木,必入森林的原则,力求通过多个关键词和兴奋点,揭示民国大学的文脉与学统间复杂的内在关联和理路,并感受细节的力量。当然,民国大学的丛林很多,我关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进入民国大学丛林的路径也很多,我走的只是属于自己的这一条。

晚清以向西方学习为基本路径的维新变法,对文化教育最为直接的冲击就是1905年的科举废,学堂兴。这是汤因比文明论所展示的“冲击-回应”模式中的所谓“主动建设性的大策略”,是国家政治行为中重大的文化教育变革,完全有别于之前民间被动性接受传教士的传教办学模式。教育模式发生如此重大的变革,必进而直接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晋身方式,也为与世界交往开辟了新路。私塾、书院、科举的废除,特别是国外现代大学的办学模式和教育理念的移植,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模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教育体制的变革是显性的,而传统士大夫内心的撕裂却是隐性的。通常认为,传统士大夫,或通常所说的遗老遗少隐隐作痛的发声是旧文学,留学生和新青年欢呼雀跃的呐喊是新文学。所不同的是语言的表现形式:文言与白话。

从京师大学堂时的取法日本,到蔡元培取法德国,再到郭秉文、蒋梦麟、胡适等取法美国,李石曾取法法国,教育家在逐步探索中,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启了多元共生的新局面^[1]。因此,我以为中国大学兴盛的头功应记在归国留学生的名下。其中作为交流第一工具的语言,因“中国的古文有科举的维持,故能保存二千年的权威”^[2]的古文也逐步转变为白话。教育是兴国立人最为基础性的方式,它不仅使人摆脱蒙昧,而且逐步改变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如果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一人一家的皇权统治的瓦解也就为时不远了。自1905年9月2日科举废除始,六年过去了,一个近三百年的王朝就分崩离析。随着民国新建,大学体制的形成和初具规模,中国社会从几千年的“官学”与“私学”并存的教育形态,向国民“公学”^[3]的公民社会转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国民教育的公共空间的变化是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建设基础。小学与中学的建制,这里不讲。我在本书中会先讨论进入民国大学的路径,然后再选择性地就文学史和学术史上一些有趣的话题展开,让大事与细节、亮点与污点、功名与私情共同在场。

“大学”这一外来的文化教育模式要在中国落地生根,需要时

间,需要有人来培育。因此,除了政府的财政扶植和民间资本(私人财团和教会)的资助外,蒋梦麟所说的大学内部校长、教授和学生的三种力量,通常也会形成一种互相促进和互相牵制的合力,成为大学的自身力量。

激进与保守

宋儒张横渠(名载,字子厚)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胸襟和志业,在民国大学的学术环境下,被西化的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所取代。同时,传统大儒文史哲兼通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一元的文化取向,也被新的学术体制下精细的学科分类人为地割裂成系科内的学术元素。《易经·系辞·下传》中所说的智者能“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境界,在科学发达的现代,更是成为玄学的邻舍。胡适说:科学就是拿证据来!要能证实,同时更要能证伪。这就是所谓的求是。胡适1922年8月26日在与日本学者今关寿麿交谈时特别强调:“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我们只认方法,不认家法。”〔4〕

“革命”是认识20世纪中国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不论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大的公共领域,还是婚姻、家庭等私人空间的一切变化,都与这一话语关联。而每一位教授、学生的个人命运又与“党派”这个关键词相关联。这是中国大学所处的特殊语境,也是其不同于外国大学之关键。研究20世纪中国大学就必须面对这一历史事实。也就是说民国的大学是处在革命的年代,是与党派政治共生存的。同时,“反革命”的罪名,也是20世纪的政党政治,特别是执政党给反对者的一项特殊的政治“待遇”。而我这里只是试图以“激进”和“保守”作为进入民国大学的路径,并展开一次有关民国的知识和精神领域的漫游。

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分别代表了激进和保守,也就是“新青年派”和“学衡派”的两种传统。其激进和保守,作为文化姿态各自在大学校园内展示出来,也显示出其所支撑的思想资源与文化背景,同时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思想观念、学术观念和文学风格。

如今都在强调学术规范和大学精神的坚守,因此各个大学的校史研究和高教研究,都开始关注各自大学的历史和学术生态的现状,注重学风建设和强化学术规范意识。各种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研究,都已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各个大学也都整理出了自己的校史,出版了相应的专题论著,基本上修复了长时间被抹黑、歪曲和遮蔽的民国大学的历史旧貌。叶文心在《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一书中提出1927年以后北京、上海、南京三城对比交错下的大学校园文化图谱:北京的丰厚文化资源和悠久传统下的国学;上海丰厚经济资源、新锐专业知识下的西学;南京国家意识形态下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所展示的党国文化^[5]。叶文心甚至形象地将这一图谱用大学师生的服装来展示:长袍、西装和制服(中山装)^[6]。

“学统”是“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合称,并非一个周严的概念。这里我提出“激进”与“保守”作为“民国大学的两大学统”^[7]的命题,试图在大学学术史这一层面上进行些有意义的探究。本着大学兴起的历史轨迹和具体的事件,发掘背后的文化精神,把握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形成及发展流变的内在脉络,在学理上超越校史的写作模式,向大学学术史靠近。在对比中,展示民国两大学统的异同,从中发掘出新的思想资源、学术资源和文学资源。什么是激进?只要看一下北京大学哲学门(系)1917—1922年间学生的名录;看看他们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互动,审视一下他们和中共早期革命的关系,就明白了:张申府、陈公博、朱自清、吴康、谭平山、康白情、顾颉刚、区声白、徐彦之、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均出自该门。其他系科的学生:傅斯年、毛子水、俞平伯、杨振声、罗家伦、

梅思平、黄日葵、许德珩、周炳琳、姚从吾等与哲学门(系)学生共同构成了五四新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和声与共鸣。此时的北京大学有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李石曾这样的大树,而我所关注的正是生长这些大树的丛林。

文脉与学统

民国的文学生态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这是基本文学史观。新的知识、思想、情感和表现形式,特别是白话国语的异口同声,以及大众报刊图书等在现代印刷业推动下的传播,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新文学。与新文学相关联的时代、政治、党派、思潮、个体和文本形式,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关系。民国大学是生长民国新文学的重要土壤。北京大学对早期白话新诗创作的呵护和推动、南开大学对早期话剧的培育和推动,以及对青年作家的培养,都是史迹清晰。1928年以后,关注民国新文学的“新文学研究”课程先后在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联大开设。原本是新文学作家的许多人进入大学成了专业的文学教授,从创作转向文学研究,同时培养文学新人。这样,也就有了几代青年作家从大学里相继走出,传递新文学薪火的人文景观。

看看民国一批重要的新文学作家的全集,多是创作、翻译和学术研究三个方面都有所建树。他们的创作有国学、西学的双重支撑。许多作家同时也是大学教授。许多并不以文学名世的学者,他们的全集中也都包含有文言旧体诗文集。民国往矣,今我来者,当知差距所在。我们不可以和他们比西学,更无法和他们比国学了。也许有人可以狂妄自大,那就给当下文科教授和当红作家一本没有标点的《左传》《汉书》,看看有几人能读得下去,更不要说让你对其进行文字、音韵、训诂的解释。至少我这个受了十年专业中文系学术训练的人对此就有切实的畏怯。我的一位老师在批评自己研究古典文学的

同事时说:你怎么连《左传》的“注”都读不懂了!

民国文学实际上由四个版块构成,这四者之间有时呈互相排斥状态,有时呈交叉叠加状态,有时呈各自独立封闭状态。以语言形式区分民国文学的事实,可以清楚呈现为:文言旧体文学(诗词曲文)、白话新体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话剧)、文白混搭的通俗文学、非汉语写作的殖民地文学(香港少数作家的英文写作、台湾以及“满洲国”时期少数作家的日文写作)。当然,这并不是十分周严的划分法。特别是旧体诗词,是晚清民国时期文人生活化的东西,是他们生活的诗意栖息方式。这与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相关联,更是中国文学传统在他们血脉中的流动。许多早年写作白话新诗的作者,后来都转向写作旧体诗词。五四新文学运动高潮时期,激烈地反对旧体文学的胡适、罗家伦、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叶圣陶都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词。旧体诗词甚至成为他们晚年文学创作的主要收获。白话新诗的作者大都是年轻人,诗龄都不长,留下的诗作相对较少,而终身坚持写作旧体诗词的诗人动辄就有上千首诗词。若以诗人的数量和诗作的产量来说,文言旧体诗人诗作在整体上大于白话新体诗人诗作。写作白话新诗的年轻人原本可以很多,但受到发表和出版机会的限制(主要是经济条件),相反,写作旧体诗词的诗人从晚清遗老遗少到民国新贵,多数有钱自己印刷(“私家刻本”),即便没有出版,也有保存下来的条件和可能。在大学分别从事植物学和动物学教学研究的著名教授胡先骕、欧阳翥也因终生喜爱写作旧体诗词,而留下大量的文学作品,科学与文学的双重追求在他们的生命中实现了有机融合。就连中共的多位领导人,1949年后都有旧体诗词出版。而非汉语写作的殖民地文学,在香港只有少量的英文作品,在日本统治的台湾,用日文写作的作家较多。

文言旧体文学的作者众多,我这里仅以“义宁陈氏”家族和“章黄学派”为例。陈三立和他的五个儿子都是诗人,陈三立对黄庭坚及宋诗的推崇,在影响“同光体”诗派的同时,更为直接地影响了他的孩子。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8]、《散原精舍诗文集补

编》^[9]）、陈衡恪（《陈衡恪诗文集》^[10]）、陈隆恪（《同照阁诗集》^[11]）、陈寅恪（《陈寅恪诗集》^[12]）、陈方恪（《陈方恪诗词集》^[13]）都留下有旧体诗集，且诗作的数量很大。而写作白话新文学作品（小说《留西外史》）的却只有陈登恪（春随）一人，后来也转向写作旧体诗词。“义宁陈氏”家族成员诗文的整理出版，成为我关注“义宁诗学”的重要依据。即便是多在大学执教研究学问的“章黄学派”成员，同时也是诗人。“章黄学派”成员 1920 年代把持北京大学文史学科，1928 年以后一部分势力开始转移到中央大学文（汪东、黄侃）、史（朱希祖）两系。章太炎、黄侃、汪东、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吴承仕等都留下有旧体诗词。仅齐鲁书社 1985 年出版的汪东的《梦秋词》，就收录有 1380 阙。以文学创作为主的周氏兄弟的白话新诗很少，文言旧体诗词居多。鲁迅《野草》中收录的唯一的一首白话新诗是《我的失恋》（早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六首白话新诗后来收录在《集外集》中）。1929 年 11 月出版的《过去的生命》是周作人唯一的一本白话新诗集。

民国年间抗拒白话新文学的“学衡派”成员，自然以坚持写作旧体诗词为文化策略之一，同时这种坚守背后是更大的思想文化上的抵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学衡派”的一些重要成员的这种坚守和抵抗，一直持续到 1950—1960 年代。吴宓 1954 年 6 月 21 日致上海的柳诒徵（字翼谋）的信中写道：“宓虽刊文自责忏，内心仍完全是《学衡》初刊时之思想耳。”^[14]1960 年 8 月 22 日他在致李赋宁的信中强调：“宓惟一系心之事，即极知中国文字之美，文化之深厚，尤其儒家孔孟之教，乃救国救世之最良之药。惜乎，今人不知重视，不知利用，为至极可痛可惜者也。”^[15]1962 年，吴宓在给李赋宁的信中列举了不愿到北京工作的六个理由，其中之一是不愿接受思想改造：“宓最怕被命追随冯、朱、贺三公，成为‘职业改造家’，须不断地发表文章，批判自己之过去，斥骂我平生最敬爱之师友。宁投嘉陵江而死，不愿……”^[16]这里的冯、朱、贺三公指的是当时被“改造”的三位著名教授冯友兰、朱光潜、贺麟。

另据 1961 年南下访问陈寅恪的吴宓在 8 月 30 日、31 日的日记中所示：“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而认为共产党已遭遇甚大之困难，……即是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独立自主，自保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 CCCP 之附庸。……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作者按：为删节式引文]吴宓特别感慨陈寅恪“威武不能屈”的事实：“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而能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17]我在《“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述》中把他们的这种坚守称之为“由学统到道统的守护”。

文白混搭的通俗小说（言情、武侠、公案等）有自己都市文化的土壤和特殊的读者群体，这个与都市、口岸、市民、报刊、出版有直接的关联，同时将中国自宋以来老白话的传统与五四新白话的形式有机地结合，形成了相对独立自足的文学空间。文白混搭的通俗小说兼容了文白两种语言的优势，争取、培育和控制了属于自己的读者群体。通俗小说家可以不屑文言旧体诗词曲作家的鄙视，不顾白话新体文学作家的反对，他们在上海、天津、北京、南京、苏州等一些重要城市，依靠自由写作，生活得很好，如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他们甚至超越了新旧文学之争，更逃离了白话新体文学作家党同伐异和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1949 年以后，这一文学的形式，被梁羽生、金庸在自由繁荣的香港文化市场发扬光大。

掌握批评和学术话语权者以所谓“主潮”“主流”的名义进行命名通常具有语言暴力性和霸权性，1949 年以前以胡适（白话活、文言死的二分进化演进论）、周作人（载道与言志互为消长的循环论）为首，其弟子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苏雪林、废名等参与开创的以“新文学”来命名的民国时期的白话文学，有意把文言旧体文学和文

白混搭的通俗小说排斥在外,或用批评的方式加以曲解,以曲解的方式加以视而不见,甚至还以偏执的思维方式否定其存在。1949年以后,在新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新文学”改换成“现代文学”,“国语”改换成“现代汉语”,甚至连与“中华民国”相关联的历史存在都加一“伪”字。我在查阅南京大学的校史资料时,看到1978年以前许多教授留下的文字中,都称自己原来工作的“中央大学”是“伪中华民国”的“伪中央大学”(自然不是汪精卫政权时期的南京“中央大学”),或参加过“伪国大”,任过“伪职”,或见过“伪校长”“伪总统”,只差说自己是“伪人”“伪教授”了。看得出,他们要由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样的一代学人的教学研究,自然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我们不必去苛求前辈,但要有清醒的认识。大陆是这样,海峡那边的台湾也如此。因为两党之间厮杀了二十多年,杀红了眼,打出了深仇大恨,曾留下互以“匪”称的三十八年隔海互不来往的局面。

结果是1979年以前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大都是只研究那点儿被政治教条过滤过的白话新文学。而随后这三十多年来对文白混搭的通俗小说研究和文言旧体文学研究,在整体实力上还无法动摇已形成的“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格局,尤其是业已形成的所谓新传统、新范式。中国人多,不同的教学层次有大量的教科书需求,不能也无法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去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一百多种以“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命名的文学史多是编写的教材,雷同者居多。也有一些“现代文学”的学界中人,条件所限,没有翻阅过一本原始的民国文学刊物,一份民国的报纸,研究的对象也只是一部删改后的白话新文学作家的全集或文集。当然,社会在进步,民国文学研究的现状在逐步改变,但要根本的改观还需要时间。自身学识、学术环境和学术分工不同,学者的表现自然各不相同。但从其研究论著中可以看出其所处的生活状态和学术姿态。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就无法面对民国大学与民国文学这一复杂的问题。民国乃新中国之前身,历史发展从来都是继往开来,盘根错节,若连正视都不敢,如何能进入研究状态? 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时,我在南京大学的课堂上对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做了三次课堂调查,三个层次的学生对中华民国哪年成立的回答有两个:1911 和 1912。几乎是对半的比例。在南京这个中华民国的首都读书的学子,经常出入于“1912 街区”,流连于“中山陵”“总统府”,亦尚有一半人不知道中华民国成立于 1912 年 1 月 1 日。更可想其他地方的学子。这种状况下,对于学生的民国历史和基本的常识,就不知道如何测试了。求知如求医。无知就像人有病不吃药一样,那是自己的选择,可怕的是吃上了自己并不知情的假药!当我向学生表达了自己的这一看法时,就得到学生有趣的回应说:“我们是被大人喂食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长大的!”也就是说更可怕的还有自己不知道吃了假药,不知道自己无知。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叙事者“我”说了句:我也吃过人!

我对学生说:“我也吃过很多假药!”

具体到民国大学的文脉,新文学领域有相对的一致性和同一性,即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现实的、浪漫的、唯美的、现代的等各种思潮并存共生。而作为新文学反对派存在的“学衡派”中人,却有着在一个文化保守的“精神共同体”内比较明显的差异性。从文脉上看,文章中,“言志”(吴宓)与“载道”(梅光迪)并存(吴宓说自己“最恨人称宓为‘韩愈’‘曾文正’”^[18];而梅光迪却相反)。诗歌中,“诗史”(胡先骕、陈寅恪)传统与“抒情”(吴宓、吴芳吉)传统共守。

民国的学者群落大致可分为大学、研究所和民间,其中多数聚集在新兴的大学校园。由于民国新建,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势力薄弱,研究院和研究所的规模、实力都是很有限的。民间的学术力量(如“中国营造学社”)越来越弱,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传统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或保留下来家学、师承的所谓绝学。因为现代科学兴起后,理工农医商法的学问都是“洋学问”,这些领域有成就的学者都是海外留学归来的。

民国大学的两大学统中,“学衡派”的内部又有明显的“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巨大差异。我在《吴宓传》中曾就《红楼梦》研究中吴

宓“尊德性”与胡适“道问学”的不同，引用了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所说的，陆九渊（象山）之学，以“尊德性”为宗；朱熹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毁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这是胡适与吴宓新旧文学、新旧学术之间的壁垒。但在“学衡派”内部，吴宓的“尊德性”与王国维、陈寅恪、叶玉森的“道问学”同样相隔沟壑。“学衡派”成员中受白璧德影响的学生中，个性迥异。我在《“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述》一书中曾指出，白璧德“尊德性”的观点直接影响了主编《学衡》的吴宓。师徒二人的观点如出一辙。吴宓是典型的“尊德性”，而对“道问学”的纯粹的知识性学问，有极端的偏见。在《空轩诗话》中，他把《学衡》作者叶玉森的甲骨文研究视为“糟粕”。他说：

叶君又工为词，且研究甲骨文。著《殷契钩沉》等三篇，刊登《学衡》杂志（二十四期、三十一期）。当时，宓为总编辑，视此类文章（谓甲骨文及考证金石、校勘版本、炫列书目等）直如糟粕，且印工繁费（须摄制铅版），极不欲登载。勉为收入，乃历年竟有诸多愚妄之人（法国伯希和氏亦其一）远道来函，专索购该二期《学衡》。近且有人取此三篇，放大另印，每册售价数元（其实仅出五角之微资，购此二册《学衡》，即可全得），而《学衡》中精上之作（如三十一期中，刘、胡、吴、景诸君长篇论文），众乃不读，或拆付字笺。此固中国近世学术界文艺界一般不幸情形，而亦宓编撰《学衡》杂志多年，结果最痛心之一事也。^{〔19〕}

即便因循文人相轻的传统，但他视从事专门学术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为“愚妄之人”，也可见其偏颇。吴宓在这方面一直是坚持己见的。他在1925年12月30日给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信中说自己“对目前从事的所谓国学研究不感兴趣，因为它避开了所有对古代圣贤和哲人伟大道德理念的哲学讨论，却将目前中国的问题和政策作为重要方向，而在那方面，我们只是做些枯燥无用的研究，或是对我们宝贵的传统进行大量毫无根据并有害的攻击”^{〔20〕}。1931

年,在法国游学的吴宓在给浦江清的信中谈到他见到自己“不喜之”“考据学者”伯希和,说:“彼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与语精神文艺。彼视《清华学报》、《述学社国学月报》为有价值之杂志,彼以李济、董作宾为上等学者。”^[21]因为李、董在河南安阳从事殷商考古发掘,为该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1931年8月17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登有张季同的《评〈先秦经籍考〉》。张文说近二十年中国“国学”研究可以对抗日本学者的有王国维、郭沫若的甲骨学,陈垣、陈寅恪的中亚语言历史,胡适、冯友兰的哲学史,傅增湘的目录学,杨树达、奚侗的训诂学。这里提到的胡适、冯友兰、陈垣、陈寅恪、杨树达,在1948年都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教育立法

体制变革给民国大学与民国文学带来的生机和活力是巨大的,也是个体力量所无法抗拒的。我这里强调六个关键时刻和事件:

1. 1905年9月2日科举废止;

2. 1911—1912年皇权废除(辛亥革命与民国新生);

3. 1912年教育部《大学令》(10月24日)^[22]确立的文、理、工、法、商、医、农“七科”之学;

4. 1913年,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令第一号》(1913年1月12日)的《大学规程》第二章《学科与科目》^[23],又将文学门分为国文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言语学,中国文学系在文科建制中也日趋独立;

5. 1920年1月24日《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

6. 1930年2月初《教部通令中小学校励行国语教育——禁止采用文言教科书,实行部颁国语标准》^[24]。此文的起草者为新文学作家刘大白。

科举废止,国民教育兴盛,小学、中学、大学纷纷兴建,作为个体

的人将接受公民教育,成为公民;旧的文体形式不再成为科举考试和个体晋升的唯一工具,文体形式的解放,由此开始。

皇权终结,三纲五常的伦纽松解,公民成为自由人,国家确立新的“国语”,同时带来文学创作、出版的自由繁荣。从事自由创新的个体,不会再像“戊戌六君子”那样因变法而被慈禧一声令下砍头。所以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上卷)中说科举“真是保存古文的绝妙方法。皇帝只消下一个命令。定一种科举的标准,四方的人自然会开学堂,自然会把弟子送去读古书,做科举的文章。……科举若不废,国语的运动决不能这样容易胜利”^[25]。个体的启蒙、解放,首先是从教育开始的。男女教育平等、职业平等、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这些都为白话新文学作家和文言旧体文学作家提供了新的创作素材,同时新旧交替时代生活、情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在作家的笔下纷纷呈现。所谓民国女性文学的创作者基本上都是受过国民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育的新女性。女作家辈出的前提是因为有了民国的大学教育。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大学之外,是男女同校。两性平等的国民教育时代由此而来。白话新文学和文言旧体文学所展示的“新女性”形象关联了民国大学与民国文学的内在机制。

教育立法、实行国民教育,教育部两次通令给白话新文学保驾护航的同时,使得白话文(“语体文”“国语”)进入国民教育体制,进而使得白话新文学获得了文学的正统地位,白话新文学作家也顺势掌握了文学的话语权。最为明显的事例就是坚持用文言文的天津《大公报》,在1931年5月22日一万号时,张季鸾听从胡适的意见将报纸改用白话文^[26]。反对者(文言旧体诗词曲文的坚守者)即便是自己坚持抵抗,却也不得不让子女到民国学校接受白话文和白话新文学,并为孩子们在白话文和白话新文学的教育下,智力和知识的迅速进步而高兴。梅光迪就是这样的代表。

民国体制下的教育立法和相关的文学及学术制度的建立,是一种行政化的行为,而对传统文学精神和文学形式坚守的人,或传统学术范式的守护者,在如此情况下都面临生存的艰难,或遭受所谓的横